



From World History to Global History: Re-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mporality of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Q. Edward Wang

Abstract: 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and its impact on historical thinking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y. The flourishing of global history stems from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worldwide, particularly the tradition of world history writing.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of national history writing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tates, characterized by methodological specificity and temporal transience.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decades spurred the revival of global history, not only rejuvenating macro-historical methods but also endowing them with new features that reflect evolving worldview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challenges Eurocentrism, emphasizing cross-cultural and 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glocaliz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world history; national history; global history; Rankean School; historical methodology; globalization

Author: Q. Edward Wang studied and taught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rom 1978 to 1987 before leaving for the US, where he obtained his Ph.D. at Syracuse University in 1992. He has taught at Rowan since 1992. His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cus on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how history is written) and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 H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works writte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theory, and food history, which have earned him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mong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Routledge, 2008, 2017) and *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從世界史到全球史： 重審民族史學的特性與時限

王晴佳

[摘要] 全球史的興起及其對歷史思維的影響可以從史學史的角度進行探討。全球史的繁榮源於世界範圍內悠久的歷史寫作傳統，尤其是世界史書寫的傳統。19世紀以來，民族史寫作的興起與民族國家發展密切相關，具有方法上的特殊性和時間上的暫時性。20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化浪潮推動了全球史的復興，不僅復興了宏觀史學方法，還賦予其新的特徵，反映了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全球史的興起挑戰了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強調跨文化、跨區域的聯繫與互動，推動了歷史研究的多元化和全球化。

[關鍵詞] 世界史 民族史學 全球史 蘭克學派 史學方法 全球化

[作者簡介] 王晴佳，1978—1987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學習並任教，1992年在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獲得博士學位。自1992年起一直在羅文大學任教。其研究和教學主要集中於史學史、史學理論和亞洲思想文化史。他出版了多部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國思想文化史、比較史學、史學理論、全球史及飲食史，並在國際學術界享有聲譽。主要代表作有《全球史學史》（羅特里奇出版社，2008年，2017年）和《筷子：飲食與文化》（劍橋大學出版社，2015年）。

毫不誇張地說，近年來全球史領域呈現出令人矚目的繁榮景象。只需隨意瀏覽任何大型圖書館的館藏，便能輕易發現大量相關著作。這些書籍要麼冠以“全球史”的標題，要麼從全球史的視角展開研究。前者涵蓋了幾乎所有可以想像的食品或商品的全球史研究，從捲心菜、咖啡、巧克力到豆類、甜瓜和松露，更不用說玉米、土豆和蔗糖了。後者則從全球視角探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獨立宣言》等重要歷史議題，或是研究20世紀60年代、70年代以及整個19世紀等關鍵歷史時期，甚至包括非洲大陸和廣袤的大西洋等地理實體。鑒於該領域出版的作品數量龐大且仍在持續增長，我們很難對全球史的廣泛吸引力及其對歷史思維的影響進行面面俱到的分析。在本文的寫作中，筆者試圖從史學史的角度，就以下三個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首先，筆者認為，近年來全球史的興起源於世界範圍內悠久的歷史寫作傳統。換言之，全球史之所以具有全球性的吸引力，是因為其驅動力長期以來深深植根於歷史實踐之中，而這種實踐不僅限於西方，更遠遠超越了西方的範圍。其次，自19世紀以來，民族史的寫作逐漸成為歐洲現代史學的主流，這一趨勢與德國蘭克學派的興起密切相關。然而，這一史學上的突破或革新具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暫時性（temporality）。它既得益於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發展，同時也反過來推動了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儘管民族史作為一種史學體裁仍然具有重要性，但它已逐漸成為一種備受爭議的傳統。在其盛行歐洲的時期，便已有人對其提出批評，而後來在全球範圍內，這種批評和質疑更是愈發普遍。^①第三，近年來全球史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可以說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浪潮的直接結果。這場浪潮不僅重新啟動了長期存在的宏觀史學視角，還為其注入了許多新的特徵。這些特徵既反映了當代世界日益緊密的互聯互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們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催生了與之相應的歷史研究方法和書寫形式。

一、世界史書寫的傳統

我從第三點開始講起。儘管關於全球化起始時間的觀點眾說紛紜，但“全球化”一詞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被廣泛使用。同樣是在這個10年中，學者們開始嘗試探討全球史的性質和特點。根據全球史倡導者之一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的看法，全球史的興起與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密不可分。這種全球化的特點體現在航太技術的進步上，表現為“外層空間的衛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地球上的人們聯繫在一起”。此外，整個世界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環境問題”，而在經濟領域，跨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些現象都超越了國家邊界。當然，表徵這種全球化的例子還有很多——馬茲利什在後來與人合編的另一部著作中便提供了更多例證。^②

2000年，全球史被列為在奧斯陸舉行的第19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主要主題之一，這一事件可以被視為全球史正逐漸成為歷史學家新興趣的重要標誌。然而，作為一種新興的史學體裁，全球史在21世紀之交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挪威歷史學家、該大會的共同主持人瑟爾維·索格內爾（Sølvi Sogner）曾評價道：“全球史正日益成為……我們共同關注的問題。……這一領域仍處於起步階段，從業者相對較少。”儘管如此，索格內爾頗具遠見地指出：“21世紀與上一個世紀有很大不同。歷史學家必須迎接新的挑戰並加以應對。”^③她的這番話無疑預見到了全球史在新

① 參見王晴佳：《論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和缺失：從全球比較史學的角度考察》，收入氏著《融匯與互動：比較史學的新視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6—43頁。

② Bruce Mazlish & Ralph Buultjens, eds.,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Introduction, 1-2, 9-10; Bruce Mazlish & Akira Iriye, eds.,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Introduction, pp. 4-10.

③ 引自 Manuel Perez-Garci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ocratic Stat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Decline of the Spanish and Qing Empires 1680-1796*,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ix.

世紀所蘊含的巨大發展潛力。

大約10年後，隨著全球史領域的迅速發展，兩部同名著作《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相繼出版，這些作品對這一新興領域的史學起源、核心概念和代表性實踐進行了系統梳理。其中一部由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撰寫，另一部由德國的日本史學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完成。康拉德的著作以現代時期為起點，探討全球史的演變與特徵；而柯嬌燕則將焦點轉向她所稱的“宏大敘事衝動”（the great story impulse），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歷史寫作的萌芽階段。柯嬌燕在書的開篇指出，在人類開始書寫文化的早期，“他們必然通過對比或比較的方式納入其他人類的歷史。這樣一來，傳遞自身起源神話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講述了一種關於世界的普遍史”。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她對早期歷史寫作形式進行了一次跨文化的考察，涵蓋從《希伯來聖經》《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到荷馬、希羅多德、中國經典以及司馬遷的作品。這一考察不僅揭示了不同文明中歷史敘事的共通性，也為全球史的起源提供了深遠的史學背景。^①

無論是否應該將其稱為“宏大敘事衝動”，古代歷史學家確實普遍傾向於撰寫“世界通史”。更準確地說，這些早期的“世界通史”，主要指的是他們的著作涵蓋了他們所知的“世界”，而不僅僅局限於他們自身的文明。例如，西方著名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曾提到，他撰寫《歷史》（注意是複數形式Histories）的目的是“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讚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錄下來，免於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喪失其應有的榮光”。其中，希羅多德使用的“異邦人”一詞，也可譯作“蠻族”（barbarians），因此帶有一定的貶義。然而，在古代，這是人們用來指代“他者”（無論是敵人還是鄰居）的常見說法。在希羅多德的案例中，也有一些現代學者選擇將“異邦人”翻譯為“亞細亞人”，以更準確地反映其地理和文化背景。^②儘管如此，希羅多德作為一位希臘人，在其著作中為非希臘人的事蹟留出了大量篇幅，以至於後來生活在羅馬時期的希臘作家普魯塔克指責他在作品中對希臘人抱有偏見和歧視。^③

與希羅多德對“他者”的濃厚興趣相比，僅比他年輕二十歲的修昔底德在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則採取了明顯的希臘乃至雅典的立場。不過就其動機而言，他同樣有意涵蓋“蠻族世界”。也就是說，儘管他顯然希望探討導致他所認為的希臘史詩般悲劇的原因，但修昔底德真正的願望是從中提煉出一種教訓，這種教訓雖然基於過去，卻可能對“瞭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提供“一點益處”。他相信，這樣的歷史教訓不只是“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久遠的”。^④

與他的希臘同行一樣，漢代中國的司馬遷也使用“蠻夷”來指代北方和南方的鄰居。然而，這種稱謂並未妨礙他對這些鄰居的記述。事實上，司馬遷在其著作中涵蓋了中國當時四方的鄰國，為後世史家樹立了一個榜樣。司馬遷的動機和實踐與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有可比之處。他像前者一樣——後者也被稱為西方地理學之父——在動筆寫作之前曾跋涉於全國各地。他又如後者一樣，相信自己的作品並非為當世而作，而是為了“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

① Pamela Kyle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London: Polity, 2008, pp.11-16.

② Donald Kelly, *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 & intro. Aubrey de Selincour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4, p.13.

③ Plutarch, "Of Herodotus' Malice," in *Plutarch's Essays and Miscellanies*, eds., A.H. Clough et a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9, vol. IV, pp. 331-336.

④ 引自 Kelly, *Versions of History*, pp. 29-35.

子”。若說司馬遷意圖撰寫一部已知世界的通史，並不意外，因為在其給友人任安的一封信中，他曾直言自己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①。

上述中國史家編寫世界通史的努力間接反映了一種世俗帝國的雄心和抱負。類似的嘗試在其他地方也比比皆是。例如，李維（Livy）是在羅馬實際上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的支持下，撰寫了一部關於羅馬崛起的通史，堪稱其史學傳統中的一個早期例子。幾世紀後，隨著羅馬人在地中海建立了一個包羅萬象的帝國，希臘史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直截了當地宣稱：對他而言，編寫一部普遍史出於了一種責無旁貸的信念。

與此同時，中東地區穆斯林文明的崛起，也就是隋唐在7世紀再度統一中國的同一時期，亦出現了類似的嘗試，以求編寫一部與倭馬亞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之帝國抱負相匹配的世界史。確實，現存中東最早的歷史文本之一是阿爾-巴拉祖里的《征服諸國記》（*Kitab Futuh al-buldan*，注意是複數形式），成書於9世紀。本質上，這是一部阿拉伯帝國的歷史——阿爾-巴拉祖里利用包括阿拉伯語和非阿拉伯語在內的多種來源，提出了一個超越“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的整體世界觀。^②而阿爾-巴拉祖里並非孤例，他的同時代人如阿爾-雅庫比（*al-Ya'qubi*）和阿爾-塔巴里（*al-Tabari*）都在他們的著作中體現了我們現在稱之為世界史興趣的傾向。在蒙古征服歐亞大陸的大部之後，更為宏偉的計畫得以展開：拉施德丁（*Rashid al-Din*）在包括兩位漢人在內的一組學者的協助下，著手編纂了一部涵蓋從愛爾蘭到中國的多卷本世界通史。^③

如果世界各地確實存在一種世界史寫作的傳統，那麼這種傳統不僅建立在帝國或世俗的推動力之上，還源於宗教或神聖動力的推動和支撐。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寫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西羅馬帝國於5世紀晚期滅亡之後，基督教會取而代之，成為其主導力量。為了使教會在神聖和世俗權力上的主導地位合法化，聖奧古斯丁撰寫了《上帝之城》，旨在將基督教置於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之中並賦予其意義。與聖傑羅姆的《但以理書注釋》一起，聖奧古斯丁為編織基督徒與“他者”或異教徒經歷的普遍歷史提供了理論和神學基礎。儘管形式多樣，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書寫在中世紀史學中堪稱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例如，被現代學術視為早期民族歷史學家之一的6世紀的圖爾主教格雷戈里，在撰寫《法蘭克人史》時實際上是從《創世紀》開始的，並在轉向法蘭克王國之前重述了早期文明的歷史。所以究其意圖而言，格雷戈里其實在撰寫一部已知世界的通史，這一點從其書的原標題《歷史十書》（*Decem Libri Historiarum*）中便可見一斑。^④

世俗或帝國對世界史書寫的興趣同樣見於歐洲。儘管查理曼大帝僅短暫統一了西歐，但他的壯舉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裏不斷激勵人們嘗試復興古羅馬帝國。在12世紀，這種嘗試在史學領域得到了弗萊辛的奧托的回應，他試圖在其作品《雙城編年史》（*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直譯為《兩座城市的編年史或歷史》）中結合神聖與世俗、普遍史與世界史，儘管他對這種融合的未來前景顯得頗為悲觀。然而，與他在地球另一端的同時代人司馬光一樣，奧托的鴻篇巨制旨在呈現人類歷史在時間上的全面性與空間上的普遍性。奧托在其書中直言不諱：在撰

①（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9冊，第2735頁。

② 參見 Ryan J. Lynch, *Arab Conquests and Early Islamic Historiography: The Futuh al-Buldan of al-Baladhuri*, London: I.B. Tauris, 2020.

③ Stefan Kamola, *Making Mongol History: Rashid al-Din and the Jami'al-Tawarik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拉施丁的一本早期譯本有趣地題為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in Englis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④ 參見 Walter Goffart,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A.D. 550-800): Jordanes, Gre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寫關於“雙城”的歷史時，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既不讓歷史的脈絡斷裂，使虔誠的讀者可以通過世事的無常與諸多痛苦瞭解凡間事務中應當避免的事物，同時又使勤奮的研究者能夠發現一份清晰無誤的、有關過去事件的記錄”。^①

在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的航行之後，歐洲進入了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世界知識的擴展為普遍史或世界史的寫作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歷史書寫也出現了將神聖歷史與世俗歷史分離的趨勢，也即更多地將歷史書寫的中心轉向後者。沃爾特·雷利爵士的《世界史》便是一個例證，其寫作實踐了讓·博丹（Jean Bodin）指出需要將神的歷史、自然的歷史與人的歷史分離的觀念。雅克·波敘埃（Jacques Bossuet）的《普遍史》儘管帶有鮮明的基督教視角，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作是一個類似的嘗試。更值得一提的是喬治·薩爾（George Sale）在18世紀中期出面主編了龐大的《普遍史》一書，與其合作者撰寫了多達65卷的內容。薩爾主編此書的動力源泉，仍然有宗教的因素，但在大體上，其《普遍史》更多地呈現了世俗事務，而非神聖事物。

二、向民族史的轉變

喬治·薩爾的《普遍史》卷帙浩繁，耗時二十餘年才完成，出版後取得了成功——得到了當時幾位思想界領軍人物的讚揚，並被翻譯成幾種歐洲語言。然而，這部作品也標誌著一個傳統的輝煌絕唱；普遍史這一傳統雖然在過去紮根已久，卻在那時開始日漸顯得過時。大約在其出版10年後，薩爾的著作受到了哥廷根大學的奧古斯特·路德維希·施勒澤爾（August Ludwig Schlözer）和約翰·克里斯托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的嚴厲批評。二人後來成為新興“哥廷根學派”的主要領導者，該學派在歷史上被視為預示了19世紀歷史寫作發展的重要特徵。施勒澤爾和加特勒的批評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他們對薩爾及其同事在編寫過程中對歷史資料的不加批判的使用提出了質疑；其二，與之相關的是，他們認為儘管該書涵蓋內容廣泛，卻更像是東拼西湊的雜燴，缺乏對世界歷史的連貫梳理。^②這些批評反映出一種對史學的新興趣，並引導了民族史的寫作，即以民族國家的興起及其相互關係為重點的歷史寫作形式。這種現象儘管在歐洲出現的步調不盡相同，但至少在17世紀已初現端倪。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史寫作的趨勢逐漸勾勒出19世紀現代史學發展的路徑，不僅在歐洲如此，更逐步擴展至全球範圍。

在歷史寫作中，考訂史實或追求真實的願望源遠流長，這在世界各地的歷史文化中均有體現。然而，當人們渴望復興某種失落的文化時，這種關注往往會顯著增強。中國的宋代便是這樣一個時期，歷史寫作在那時達到了繁榮的巔峰。同樣，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也是一個例證。在復興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興趣驅動下，人文主義者和博古學者攜手合作，通過改進“著史術”（Ars Historica），發展出“批評術”（Ars Critica），將研究與文采相結合，即將史料考證與敘述流暢融為一體。這種對精準學術的追求在15世紀因印刷技術的普及而得到進一步強化。當時，文字學（philology，亦譯文獻學、語文學）的方法被廣泛應用於歷史文本印刷前的校勘，以確保其真實性和有效性，防止偽書、偽作以及文本的篡改和刪減。^③

① Otto, Bishop of Freising, *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D.*, trans. Charles C. Mier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6.

② 有關薩爾普遍史在歐洲的榮衰，見 Zhang Yibo, “The Decline of a Tradition: The Changing Fate of Sale’s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53:2 (2020), pp.107-121. 有關18世紀史學界的哥廷根學派，見 Georg Iggers,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1760-180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Historiography: Critical Readings*, ed. Q. Edward Wang,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vol. 2, pp.276-296.

③ 見Anthony Grafton, *Joseph Scaliger: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v. 1, 14;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p.47.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文字學家出身的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引領的歷史學家轉向利用檔案來撰寫歷史，因為與其他來源相比，檔案更可靠且更貼近現實。儘管一些歐洲王國已經收集檔案資料數個世紀，但直到19世紀初，民族國家才開始系統性地保存政府檔案，並開放供公眾使用，尤其為歷史研究和寫作服務。政府檔案的使用與民族史學的繁榮並非巧合，當許多歐洲國家建立起國家檔案館時，民族史學也隨之蓬勃發展。

不過饒有趣味的是，對世界史發展加以通貫理解和描述的興趣，仍然有增無減、經久不衰。在歐洲，17世紀科學革命的成就為這一努力還注入了新的動力。受到艾薩克·牛頓、伽利略·伽利萊等人在革新自然世界知識方面成果的啟發，人文學科的學者們也開始尋求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人類世界。賈姆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為後人譽為歐洲第一位歷史哲學家，他將自己的作品命名為《新科學》（*Scienza Nuova*），正是這一趨勢的體現。在維柯之後約三十年，伏爾泰創造了“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一詞，強調在其寫作中對歷史運動進行推測的必要性，隨後其他類似嘗試接踵而至。有趣的是，這些嘗試總體上更傾向於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而非民族主義。伊曼努爾·康德對歷史進程的哲學考量應該是有力的說明，體現在他的《世界公民視角下的普遍歷史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和《論永久和平》（*Toward Perpetual Peace*）兩部論著。康德的這些作品體現了對歷史運動的廣泛視野和超越國家界限的思考，進一步推動了對世界史的普遍性理解。

不過，儘管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觀念依然盛行，但從18世紀起，民族國家逐漸成為哲學家 and 史學家關注的核心。在英國和法國等率先形成的民族國家中，史家們開始圍繞國家的興起撰寫歷史。大衛·休謨和凱瑟琳·麥考利是早期的代表，隨後托馬斯·B.麥考利和亨利·哈蘭展開了規模更為宏大的歷史著述。在法國，奧古斯丁·梯也里和儒萊也以相似的熱情投身於民族史的寫作，成就斐然。在美國，第一代和第二代歷史學家同樣青睞民族歷史，他們熱衷於描繪這個新興國家的崛起歷程。這種對民族國家的關注標誌著歷史寫作從普遍性視角向民族性主題的轉變，並為後續民族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相比之下，中歐地區的歷史書寫經歷了一場有趣的轉變，其中圍繞國家的討論佔據了核心地位。對康德而言，國家的建立平衡了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其歷史角色十分重要。然而，這種理想主義立場在約翰·赫爾德（Johann Herder）的批判下得到了修正。赫爾德對國家的態度具有較強的批判性，但他卻被視為民族主義的先驅，因為他認識到民族（*Volk*）的重要性，或更嚴格地說，他認識到基於共同文化傳統和語言統一的民族在推動近代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同樣，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對國家起初也持批評態度。他與赫爾德一樣，更傾向於將國家視為一種政治力量，而非文化實體。然而，洪堡在德國解放戰爭期間，尤其是在德國人及其他歐洲人反抗拿破崙侵略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國家的必要性。如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Iggers）所說，赫爾德和洪堡共同奠定了德國歷史思維傳統的基礎，而洪堡在晚年則“認識到了國家在民族中的核心作用”。^①確實，如果說洪堡的歷史觀發生了顯著變化，那麼這種變化無疑與拿破崙戰爭期間及之後席捲歐洲的民族主義浪潮密切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黑格爾和蘭克對歷史的性質及其用途的理解存在顯著差異，但二者都完全認可民族國家在塑造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於黑格爾而言，國家是理性實現的最佳形式，

① 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2.

它通過精神與政治的統一，將普遍性與個體性結合在一起。而蘭克則避開了這種形而上學的思考，著力闡釋民族國家在具體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確實，正是通過他自1824年開始的民族歷史寫作，蘭克，這位早年以文字學家身份起步的學者，奠定了他卓越的歷史學職業生涯，並贏得了“現代科學史學之父”的稱號。如前所述，蘭克對文字學的興趣加強了他對歷史寫作中使用可靠史料重要性的敏感性。他之所以轉向使用民族國家保存和提供的檔案資料，正是因為這些資料幫助驗證和支持他的目的。然而，儘管他對使用原始資料的宣導成為他持久的學術遺產，蘭克轉向使用檔案的實踐卻是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羅曼和日耳曼諸民族的歷史（1494—1514）》並獲得柏林大學職位之後才開始的。換句話說，蘭克作為“現代科學史學之父”的遺產，主要體現在以民族國家為其歷史寫作的核心內容，並將史料批判作為其標準方法，而前者顯然優先於後者。

更重要的是，儘管蘭克撰寫了幾乎所有主要歐洲國家的歷史，他對民族史的觀點並非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礎之上，這與後來的民族主義史學表現出的特徵有所不同。他的第一本書的標題用“諸民族史”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因此，此書雖然在廣義上屬於民族史，但它實際上探討了多元的民族歷史。而他在晚年投身撰寫世界史的行為則進一步表明，在蘭克眼裏，儘管民族國家的興起是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發展，但這一現象的意義應當超越單一民族的界限，從整體上加以理解和描述。

舉例而言，在出版其處女作之後，蘭克如此闡述了他對歷史著述的觀點。一方面，他強調歷史學家需要關注“具體的細節”；另一方面，他又很快補充道：“然而，這並不足夠；歷史學家還必須關注事物的普遍性……世上沒有一個民族未曾與其他民族產生過聯繫。正是通過這種外部關係，而這種關係又取決於一個民族的獨特特徵，民族才進入世界歷史的舞臺，因此書寫普遍史必須聚焦於此。”^①換句話說，雖然蘭克是將民族史確立為現代史學主要形式的先驅，他到晚年轉向世界史的寫作實際上是他歷史觀的一個自然延伸。因此，瑞士歷史學家愛德華·富艾特（Eduard Fueter）在20世紀初撰寫的史學史著作中進而指出，蘭克是當時“民族史理論的反對者”。儘管“他並未否認民族性的意義”，但蘭克也不願奉行“對民族性唯一拯救作用的教條式信仰”，因為正如富艾特解釋的那樣，“根據蘭克對歷史運動的理解，歷史的發展從未僅僅發生在單一民族之中”。^②

到了20世紀下半葉，美國思想史家利奧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對蘭克的歷史觀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蘭克思想中的“二元性”，包括他對世界史和民族史寫作的處理方式。首先，克里格指出，蘭克轉向民族史寫作既繼承了前一時代普遍史的傳統，又在某些方面有所偏離。其次，他的民族史寫作方式與他對普遍史的獨特理解和方法密切相關，這反映了他將歷史寫作建立在直接證據或原始史料基礎上的意圖。在克里格的描述中，蘭克“宣導了一種歷史科學，以對史料的批判性研究為基礎，並將這些史料組織成一個層級結構，其頂點是與歷史事件同期、盡可能貼近歷史行動者而遠離歷史學家的原始文獻”^③。簡而言之，儘管對史料批判的重視和技術並非蘭克首創，但他對優先使用檔案資料的宣導使他轉向了民族史寫作。不過，蘭克治史的主要興趣仍然在於考察各民族之間的國際關係及其互動。

無論蘭克被視為保守派還是革命者，他在近代史學史上掀起了一場運動，而這一運動恰逢其

① Leopold von Ranke, “A Fragment from the 1830s.” Quoted in Fritz Stern, ed.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p.59-60.

② Eduard Fuete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 München: Druck und Verlag von R. Oldenbourg, 1911, p.475.

③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2.

同胞們尋求德國統一的激蕩時代。^①如前所述，蘭克的第一本書探討了早期現代歐洲多個民族的歷史，但此後他主要撰寫關於單一民族的歷史，無論是英格蘭、法蘭西還是德意志，這些著作都集中於他認為與這些國家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形成密切相關的時期。同時，他在這些民族史寫作中廣泛使用了檔案資料。這一切對他的同時代人以及追求歷史學職業的年輕一代歷史學家而言，都是一個典範。蘭克的寫作不僅奠定了民族史在現代史學中的地位，也為後來的歷史學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尤其是在運用原始資料方面。

在筆者看來，蘭克之後有兩位德國史家在確立民族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以政治史為主的史學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的工作聚焦於政治、外交和軍事精英的成就，使這種寫作形式成為19世紀後期新興歷史學職業的主導形式之一。其中一位是海因里希·馮·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為蘭克的主要弟子之一。他以研究中世紀歷史起步，其處女作有關十字軍東征，隨後轉向研究近代歐洲歷史。追隨蘭克的腳步，西貝爾利用官方資料撰寫了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作品，並很快將這種方法運用到對國家檔案的批判性使用中，以撰寫他最著名的著作《由威廉一世建立的德意志帝國》（*Die Be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durch Wilhelm I*）。這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作品，不僅關注單一民族，還聚焦於單個偉人。另一位是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他雖然不是蘭克的受業弟子，但於1874年接替蘭克成為柏林大學的教授。與西貝爾一樣，特賴奇克的研究重點是政治家的傳記，這些政治家是他最知名的多卷本著作《十九世紀的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中的主角。特賴奇克深信“人創造歷史”，因此在書中詳盡地記錄並讚揚了那些在統一德國的國家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政治家的成就。而事實上，西貝爾和特賴奇克都積極參與了政治進程，兩人均作為選舉產生的議員活躍於普魯士統一德國的宣導中。他們在歷史學與政治領域中的輝煌職業生涯，體現了當時國家建設與歷史學研究之間看似自然的結合。此外，兩人還先後擔任1859年創刊的《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主編，推動了他們的歷史觀，使其成為歷史研究的典範，並對德國乃至歐洲以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以《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為榜樣，歷史學職業化和歷史專業期刊在19世紀下半葉陸續出現於法國、英國、日本和美國（按時間順序）。此外，蘭克學派的史學模式通過1889年恩斯特·伯倫漢（Ernst Bernheim）出版的《史學方法與歷史哲學教程》（*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本書迅速流行，成為每位有志進入歷史學領域的學生的指南。伯倫漢是格奧爾格·威茨（Georg Waitz）的學生，而後者是蘭克的另一位重要弟子。伯倫漢早在1880年便出版了《歷史研究與歷史哲學》（*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在書中討論了赫爾德、康德、費希特、謝林、孔多塞、孔德和巴克爾等人的歷史思想，這些思想融合了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視角。然而，到他撰寫第二本書時，歷史哲學已不再是他的主要興趣；取而代之的是，他的關注點轉向了歷史學方法論，特別是對書面文獻的批判性使用。這一新的興趣可以從他對當時歷史類型的分類中看出——他將歷史書寫分為“通史”和“專史”。後者包含多個子類，而前者主要包括三種類型：普遍史、民族史和哲學史。不過，在他看來，哲學史也是一種普遍歷史。他定義“通史”為“關於國家的一般歷史，也被稱為世界史，早期也被稱為普遍史：一種涵蓋所有民族歷史的簡明編年

① 見 Peter Burke, “Ranke the Reactionary,”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 Georg Iggers & James Powel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6-44.

體序列”。

伯倫漢本人對民族史的定義更接近蘭克的模型，而非西貝爾和特賴奇克的做法。同時，伯倫漢也指出，蘭克的普遍主義方法在民族史學中曾受到過批評。他引用了奧托卡爾·洛倫茨（Ottokar Lorenz）的意見，後者嘲諷蘭克寫作民族史的構想，認為其模糊且不切實際，因為這一設想期望“掌握人類在能力、知識、創造力以及文化發展的因果聯繫方面的全部範圍”。^①不過，雖然伯倫漢本人仍在一定程度上忠於普遍史的傳統，但他對史料批判的關注使其最終青睞民族史的書寫。

在伯倫漢出版《史學方法與歷史哲學教程》之後，法國歷史學家查爾斯·維克多·朗格諾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查爾斯·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於1898年共同撰寫了《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並幾乎立即被翻譯成英文。如果說伯倫漢在民族史學興起的過程中充當了某種過渡性人物，那麼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則完成了這一轉變。兩本書都旨在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南，且它們的出版僅相隔十年，但二者的差異卻非常明顯。與伯倫漢不同，這兩位法國歷史學家直到書的最後才討論歷史的類型分類。他們的分類也比他們的德國前輩更加簡化，將歷史寫作分為兩類：綜合性作品和專題性著作，並且明顯青睞於後者。此外，雖然伯倫漢強調文獻作為一種歷史資料的重要性，但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則將這一重點進一步推向了極致。實際上，他們的書開篇便討論了“文獻：其性質、用途和必要性”，並以一句著名的話開始這一章節：“歷史學家的工作離不開文獻，文獻是承載過去人類思想與行動痕跡的橋樑”（前一句後來被傅斯年簡化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口號）。書的第二部分則詳細探討了如何從外部和內部兩個層面審查文獻的真實性。易言之，雖然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像伯倫漢一樣提到了歷史研究中的其他輔助學科（如考古學、碑銘學等），但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教導未來的歷史學家如何將文獻記錄作為寫作的主要來源。這種對文獻批判的高度重視使他們的著作成為提倡民族史寫作方法論的又一里程碑。^②

三、作為全球史的世界史

對於書面文獻的興趣和對其考證的重視，尤其是以政府檔案為“頂級文獻”的研究，在此後的歷史書寫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我認為這也是削弱普遍史或世界史傳統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世紀後，當邁克爾·蓋耶（Michael Geyer）和查爾斯·布萊特（Charles Bright），兩位研究歐洲歷史的美國歷史學家（其中前者在德國出生並接受教育），於1995年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發表關於世界歷史興起的文章時，他們以這樣一個觀察作為開篇：由於“對專業化的無情追求”，世界史的書寫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合法、不專業、因此愚蠢的事業”，成了“業餘愛好者的保留地”，卻被歷史學界整體上視作“一項非學術的追求”。不過，儘管他們的評估看似悲觀，但他們當時發表題為《全球時代的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的文章這一事實表明，世界史的書寫已經在重新回歸歷史學界的軌道上。這暗示了全球化時代為世界史研究帶來的新契機和新視角。^③

筆者以為，世界史重新興起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儘管世界史的書寫

① Ernst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03, p. 47, p.51.

② Charles-Victor Langlois & C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ans. G.G. Berry,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66, p.17.

③ Michael Geyer &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4 (Oct. 1995), pp.1034-1060; 引語在p.1034.

曾被認為是“愚蠢的”行為，但在整個20世紀，無論是在歷史學界內部還是外部，都有足夠多的“愚公”敢於涉足這一領域。兩次世界大戰也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對蘭克學派代表的近代史學模式的批評。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影響促使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超越了傳統的三分法歷史分期（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他用分析全球文明的興衰取代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敘述。與此同時，H.G.威爾斯（H.G. Wells），一位多產的作家，出版了他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其範圍同樣廣泛，從人類歷史的初始一直延續到他所在的時代。然而，在職業歷史學家的眼中，儘管威爾斯的嘗試表現得世俗甚至帶有科學色彩，他的作品仍帶有舊式普遍史的影子，並被視為一種“業餘”嘗試。儘管如此，《世界史綱》成為當時的暢銷書，並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與此同時，斯賓格勒對文明的重視以及他的世界主義視角激發了英國的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二戰”後對全球範圍內的人類歷史展開了更為全面的研究。而湯因比又在20世紀60年代鼓勵加拿大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探索他那條充滿曲折的世界史寫作之路。總體而言，這些對世界史的嘗試與方法在不同程度上背離了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在“一戰”前發起的宏偉計畫，即編纂一部多卷本的關於民族國家崛起的世界史。《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這部在阿克頓去世後出版的巨著，以歐洲中心論為特點，其章節集中於導致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戰爭與革命，與蘭克對世界史的概念化頗為相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史寫作出現了更為強勁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專業歷史學家參與其中。例如，戰前的《劍橋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在喬治·諾曼·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的指導下得到了更新。他與其前任阿克頓勳爵一樣，是劍橋大學近代史的欽定教授。新版的《劍橋近代史》同樣採取宏觀的視角，但也更為關注政治領域之外的主題。儘管書名有些誤導性，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於1965年出版的《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並不像人們可能預期的那樣以歐洲為中心。這部書在“冷戰”期間出版，其成功促使其他學者探索替代民族歷史的方法，並嘗試將世界史確立為一門獨立的史學領域。

從方法論的角度著眼，一種更具革命性且更有意義的嘗試其實在早些時候已經出現。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於1949年出版的巨著《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Era of Philip II*），儘管不能視作一部世界史，但其影響顯著地弱化了政治精英作為蘭克學派民族史學中主角的作用。布羅代爾的鉅作不僅將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對“長時段”（*longue durée*）視角的宣導也使得許多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者將注意力從民族國家轉向了更廣泛的史學領域。

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經歷了從中國開始到歐洲和北美的社會文化的巨大變革。這一轉型時期對歐美學界的影響是，孕育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出版物，重新塑造了世界史，其影響持續至今。這些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再通過考察現代西方如何將其影響擴展到全球來定義世界史的發展方向，而是聚焦於非西方地區如何應對和互動於現代西方的挑戰。菲利普·D.柯廷（Philip D. Curtin）、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和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等人的研究就體現了這種轉向。柯廷對早期現代時期三角貿易的研究將足夠的注意力引向了非洲，而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則將拉丁美洲等地區納入了視野。克羅斯比的研究方法更具批判性：通過分析後哥倫布時期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交流，他揭示了現代西方崛起所帶來的不良後果，這不僅體現在歷史和地理層面，還包

括生物學、植物學和人口學的層面。同樣以批判性視角，愛德華·賽義德揭示了學術研究以及文化觀念和想像中西方與東方（或“西方”與“東方”）的既定對立關係。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在1965年出版《西方的崛起》之後經過十年的沉寂，於1978年發表了《瘟疫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s*，注意複數形式）。與前作中可能仍存的歐洲中心主義殘餘相比，這本書的視角更加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為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

推動戰後世界史研究和書寫的另一股力量來自公眾的興趣，尤其是公立學校教師的教學需求。這一點從1982年美國世界史學會（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中可以看出，公立學校教師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90年，該學會還資助了《世界史雜誌》（*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創辦，該期刊一直由傑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負責編輯，直到他於2012年不幸去世。作為世界史專著研究發表的主要平臺，該期刊至今仍具有重要地位。除了編輯期刊之外，本特利本人撰寫了許多具有深刻見解的作品，這些作品對新興領域的特徵和前景進行了寶貴的分析，同時從概念和方法論兩方面挑戰了以國家為中心的傳統史學。其中，他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與赫伯特·齊格勒（Herbert Ziegler）在21世紀初合作出版的兩卷本《傳統與相遇：以全球視角看待過去》（*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中譯本題為《新全球史》）。在這部書中，本特利和齊格勒延續了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和萊夫頓·斯塔夫里亞諾斯（Leften Starvrianos）早期探索的實踐，努力提供一種非種族中心主義的視角，從時間的開端到當代，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融合。他們的努力得到了廣泛認可——該書出版後經過多次修訂，並被眾多大學選為世界史教學的首選教材。通過這種方式，本特利和齊格勒成功地為世界史領域奠定了重要基礎，同時推動了全球史教育的普及化和標準化。

無論是在西方世界內部還是外部，馬克思主義在戰後時期為世界史研究方向的奠定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英國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小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儘管該小組在成立十年後解散了，但其中一些成員創作了重要的與世界史相關的作品，產生了深遠影響。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關於現代世界興起的三部曲就是一個例證，而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則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分析。這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強調從社會經濟結構與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視角，去理解現代世界形成的過程，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和批判性框架。這種方法論不僅拓寬了研究領域，還使得全球史的寫作能夠超越單一的民族或地區框架，從更廣泛的全球和結構性視角探討歷史問題。

馬克思主義對世界史研究的持久影響在東亞尤為顯著。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馬克思主義史學逐漸在中國興起，在抗戰期間得到長足發展。1949年之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史學界的主導力量，推動了世界史的研究、寫作和出版。馬克思主義影響日本史學，也在20世紀初年便已開始，但在“二戰”期間受到抑制。日本戰敗之後，馬克思主義及左翼史家重獲自由，成為了改造日本近代史學的先鋒力量。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基於歐洲經驗發展了他們的世界歷史發展觀，但他們的理論旨在具有普遍適用性。正是鑑於馬克思主義強調普世性的重大影響，中國和日本的高等教育機構中，世界史逐漸成為歷史教學和研究的一個獨立領域。這一趨勢不僅使兩國的歷史學者能夠對各自國家的過去進行比較和批判性的審視，還推動了更廣泛的全球視角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東亞世界史書寫，也結合和反映了民族主義的訴求，目的是形成一種抗衡西方的歷史敘事。換言之，通過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本國的歷史敘事，東亞的歷史學家嘗試在全球視野中定義和理解他們國家的歷史發展。這既

體現了全球化的視角，也反映了地方性的民族關懷。^①

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最後10年，隨著全球化這一新歷史趨勢的興起，全球史逐漸超越世界史，成為更受歡迎的研究領域。全球化將世界許多地區以經濟等多種形式聯繫起來並席捲全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史與世界史之間的差異不僅僅體現在名稱上。首先，自21世紀初以來，作為一種歷史寫作體裁的全球史的興起，與全球化的加速密切相關。儘管學者們對全球化的真正起始時間存在分歧。例如，邁克爾·蓋耶（Michael Geyer）和查爾斯·布萊特（Charles Bright）認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之前，歸因於西方的崛起及其對世界其他地區提出的挑戰與激發的回應；而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和入江昭（Akira Iriye）則更加重視戰後時期太空技術的顯著進步和經濟合作對加速全球化進程的新推動力。儘管觀點有所不同，但他們都一致認為，全球化使歷史學家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世界的緊密聯繫。^②換言之，雖然世界史始終致力於呈現歷史發展的宏觀視角，但全球史的研究則更加注重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在各個層面上的互動。全球史不僅僅是對大規模歷史進程的描述，而是一種通過互動與聯繫探索歷史發展的全新模式。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史對文明間聯繫的關注並非前所未有。如上文所述，蘭克對世界史的構想就強調，民族的發展並非孤立發生，而是往往在與其他民族的互動中形成積極的關係。事實上，跨國史或國際史一直是歷史學家積極探索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也構成了今天全球史研究的一種可行實踐。然而，全球史與過去幾個世紀的世界史之間的區別在於，現代全球史學家不僅從國家層面研究和分析聯繫，還從意識形態、性別、人口、環境以及物質文化等多種維度切入。全球史與傳統世界史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它努力在現代史學中弱化民族國家的中心地位。這一差異源於當代歷史學家的認識：歷史聯繫的表現形式遠遠超出民族國家的範疇。例如，全球面臨的環境挑戰顯然超越了國家邊界，成為一種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同樣，性別不平等也是世界各地許多女性共同經歷的現實。這些例子表明，全球史通過跨越民族國家的局限性，探索更加多元和普遍的歷史連接方式，展示了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論創新。

復次，全球史的主要動因和特徵之一在於對種族中心主義，尤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和挑戰。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在其著作《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中恰如其分地指出：“在大多數較早的世界史中，各種巨大歷史單元（例如文明）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並未被忽略，但研究的主要焦點仍是這些文明各自的發展軌跡，其動力主要被描繪為內生的。”他進一步區分道：“這些並行的歷史隨後通過從權力中心向邊緣擴散的過程被聯繫起來。在近代，這種擴散通常表現為從西方向‘其他地區’的轉移。”^③確實，在近年來全球史興起之前，過去時代的幾乎所有世界史都傾向於從本位視角描述已知世界。近代西方的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史也不例外，通常專注於描述民族國家——這一形式首先在西歐出現——如何成為全球範圍內的主導政府形式。儘管這些世界史在範圍上宣稱具有科學客觀性，但不可避免地突出了康拉德所描述的“從權力中心向邊緣擴散”的特徵。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萊夫頓·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s）在這一領域早期的一部作品中曾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全球史“關注所有人類，而不僅僅是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就好

① 參見王晴佳：《放眼全球、再現亞洲：全球史在東亞的興起、演變和前景》，蔡霽安譯，《江海學刊》2023年第2期。有關日本戰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見 Curtis Anderson Gayle, *Marxist History and Postwar Japanese Nationalis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3.

② Geyer &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Mazlish & Iriye,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pp.4-10.

③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3.

像讓讀者站在月球上俯瞰我們整個廣闊的星球”（著重點為原文所有）。^①這種非中心化的全球視角旨在突破傳統世界史的局限，以更加平等和全面的方式審視人類歷史的發展。

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動力成為推動全球史作為一種新興體裁崛起的主要驅動力。誠然，在2000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全球史選為主要議題之一時，這一領域仍處於初始的階段。然而，兩部同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強有力地挑戰了現代史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便是其中之一。這部作品不僅將中國，尤其是江南（長江三角洲）納入比較視野，還提出英格蘭成為首個工業化國家並非某種歷史宿命，而是諸多歷史偶然性的結果。從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同年出版的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將歐洲地方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對現代歐洲作為文化中心及其自認為引領世界歷史發展的命運進行了批判性反思。這兩部作品不僅從理論上挑戰了歐洲中心主義，還通過將其他地區引入敘事，突出了全球史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它們標誌著全球史在理論與方法論上的重要轉捩點，也為超越傳統歐洲視角的歷史寫作提供了新的框架。他們在現代史學中去中心化歐洲的努力，尤其在比較視角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趨勢也在其他作品中得到了呼應。例如，2015年版的《劍橋世界史》（*Cambridge World History*）便是一個典型案例。該書由梅瑞·威斯納-漢克斯（Merry Wiesner-Hanks）擔任主編，傑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人任副主編，勾勒了從古代到當代的全球歷史發展進程。這部書的規模與一個世紀前的《劍橋近代史》相當，但它不再通過聚焦民族國家的興起來構建歷史敘述。相反，這本書的第六卷（涵蓋1400年至1800年）將注意力轉向該時期歷史變革的驅動因素，例如“宏觀和交匯區域”、環境、技術、城市化與性別的“全球矩陣”，“遷徙”“貿易”以及“宗教變化”。換言之，除了卷中的《比較政治軌跡》一章外，民族國家或政治史並未成為敘述的核心，而該章的標題也表明其採用了比較的視角。^②

同年開始，牛津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五卷本的《牛津歷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由丹尼爾·伍爾夫（Daniel Woolf）主編，其他多位學者協助完成。這部著作以比較視角和全球視野為特色，展現了世界範圍內從過去到現在歷史文化的活力與延續性。它代表了一項重塑史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努力，該領域在形成過程中長期受到歐洲中心主義的深刻影響。該書及其他類似作品通過弱化民族國家的中心地位，轉而強調跨文化、跨區域的聯繫與比較，重新定義了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和敘事框架，也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史在現代史學中的地位。^③除了比較視角的追求外，強調和呈現全球史寫作中聯繫性的努力也催生了許多富有成果的出版物。在伍爾夫的著作出版之前，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Iggers）、王晴佳（Q. Edward Wang）和蘇普麗婭·穆克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的《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擴展了史學研究領域，著重探討了全球趨勢與地方傳統之間的相互作用。^④

① L.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0, p.x.

② Merry Wiesner-Hanks,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vol. 6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World, 1400-1800 CE,” ed. Jerry Bentley, Sanjay Subrahmanyam & Merry Wiesner-Hanks, Part I & II.

③ Daniel Woolf, ed.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16, 5 vols.

④ Georg Iggers, Q. Edward Wang &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2008 and 2017. 中譯本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和再版。

在探索全球聯繫的過程中，飲食與植物史領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領域的研究，如同環境或氣候問題一樣，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邊界。無論是新大陸作物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還是舊大陸及其他地區植物的擴散，都引起了歷史學界的廣泛關注。例如，作為一種全球現象的飲茶文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視角，以理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文化對話如何塑造現代世界。同樣，全球範圍內可口可樂、麥當勞、中餐外賣和日本壽司的流行，也揭示了食物文化在全球歷史中的作用。此外，棉花雖然不是一種食品作物，但作為一種同樣重要的全球性商品，其研究也為現代世界歷史的進程提供了新的見解。這些研究表明，通過分析跨文化的擴散和互動，全球史能夠展現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深層聯繫，並以具體而生動的方式揭示全球化進程的多樣性與複雜性。^①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一書便是一個顯例，其中強調西方的崛起離不開與其他地區的密切聯繫和互動。^②

總而言之，通過在超越民族國家及現代歐洲主導地位假設的不同層面開展全球史研究，以展示世界的聯繫性（通常採用比較視角），這一領域有助促進歷史研究的新穎和豐富，意味著全球史在概念理解和方法論上都表現出多樣性。目前，全球史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和實踐。正如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和夏多明（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 Dominic Sachsenmaier）所觀察到的那樣：“對於全球史而言，正如歷史的其他領域一樣，地方塑造了全球：全球史的世界並非一馬平川。”^③這種多樣性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史學發展。例如，將帝國作為國家的替代概念的研究興趣重新興起，常常結合政治史、飲食史和植物史的視角進行探討。與此相關的是海洋史的興起，這一領域以布羅代爾對地中海的開創性研究為基礎，但也遠遠超越了這一範圍，為理解自然與人類在新的地理和帝國背景中的互動提供了全新視角。移民史的研究同樣是相關領域之一，它結合了人口統計學、地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方法。此外，關於大陸、文明、地區和民族之間多層次互動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義，這些互動往往受到宗教、文化、政治乃至民族利益的驅動。^④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全球史從宏觀層面著眼於全球交流、矩陣和模式，但個體與地方也重新成為關注的焦點，推動對世界範圍內跨文化聯繫的深入研究。實際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全球史的興趣如今已不再局限於全球史學家的研究實踐，而是擴展到了整個史學領域。這表明全球史已成為當代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重新定義歷史研究、走出民族史學的傳統開闢了新路徑。

[責任編輯：馬慶洲]

① 比如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2015.

②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強朝輝、劉風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③ Beckert & Sachsenmaier, *Global History, Globall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 ed. Sven Beckert & Dominic Sachsenmaier,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Introduction, p.7;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有關中國史家的全球史研究及其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見Perez-Garci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王晴佳：《放眼全球、再現亞洲：全球史在東亞的興起、演變和前景》。